

王东京 主编

2014年

第3册

中国经济观察

中国经济何以突围

面对经济波动要有自信

理性看待地方债

中国股市为什么不涨

直面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2014年 第3册

中国经济观察

王东京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2014 年第 3 册/王东京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035-5488-9

I. 中… II. 王… III. 中国经济-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5673 号

中国经济观察 2014 年第 3 册

责任编辑 曲 炜 楚双志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珏	刘 伟	刘海藩	江小涓
李兴山	张尧学	张卓元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		

主 编 王东京

副主编 赵振华 (常务)

韩保江	潘云良	梁 朋	孙小兰
-----	-----	-----	-----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安培	王 健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
宁向东	孙小兰	张 军	张维迎	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	郑介甫	赵振华
洪银兴	顾海兵	黄少安	梁 朋	韩保江
谢鲁江	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君超	石 霞	田应奎	刘振英	刘艳梅
李 鹏	李 蕾	李旭章	李省龙	李继文
张 开	张玉杰	张慧君	杨 振	陈宇学
陈启清	施 红	胡希宁	赵锦辉	徐平华
徐祥临	袁 辉	郭 威	郭兆晖	贾华强
曹 立	曹 新	董艳玲	鲍永升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中国经济何以突围
How China's Economy Make a Breakthrough

王东京 / 3

面对经济波动要有自信
Keep Confidence When Faced with Economic Fluctuation

姜 波 / 12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国家治理前路绵长
Build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 Long Way to Go

王佳宁 / 23

理性看待地方债务
Rational Reflections on Local Debts

梁 朋 / 38

全球治理：中国必须有所作为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and Can Make a Difference

荆林波 / 48

中国股市为什么不上
Why A Continually Rising China's Stock Market Still Missing

何诚颖 / 56

学科建设基金为何漏洞百出
Why So Many Loophole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und

王玉霞 / 71

怎样提升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和产业聚集能力
How the Abilities of Small Cities and Towns can be Improved in
Developing Thei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贺军科 / 77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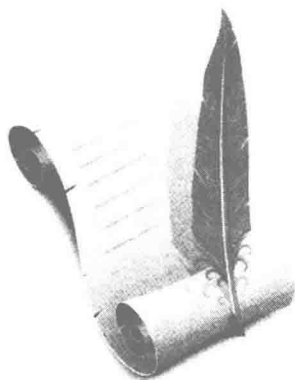
- 直面中国经济新常态 陈启清/89
Confront the New Normality of China's Economy
- 民企有权冠名“中国”吗 顾海兵 盛小伟/98
Is a Private Company Entitled to Register “China” for its Name
- 碳排放权界定的学理视角 桑瑜/106
Carbon Emission Right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 银行同业业务要堵邪路开正门 张吉光/113
Inter-bank Business New Management: Deterring the Perverted Activities and Quick Adjustment to Market Orientation and Fair Play
- 对经济危机的新解释 张开/123
New Explanations for Economic Crisis

短论 Remarks

- 不必“谈债色变” 贾康/139
No Turning Pale at the Mere Mention of Debt
- 金融市场有待正本清源 左晓蕾/142
A Thorough Reform Required in Financial Market after Clarifying Some Matters
- 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 晏驹腾/147
A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 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精神 蒋汉祥/152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Entrepreneurship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中国经济何以突围

王东京*

近几年对欧美经济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先是美国金融危机，后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与此对应，中国经济却风景这边独好，2010年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不承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突然启动 TTP 与 TTIP 谈判，试图通过推行“贸易保护”对我们进行围堵，而同时“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也大行其道。中国经济能否突围而又何以突围？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无关

无需讳言，近两年中国经济已感受到下行压力，有人断言是因为遭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学界早有类似的说法，且近来拿“陷阱”说事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还据此料定中国经济从此会走下坡。其背

*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中国经济观察》主编。

后的潜台词是，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谁也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

是这样吗？说实话，我个人不同意将当下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甚至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本身也有质疑。这些天查阅文献，发现有个现象很奇怪，众人皆说中等收入有陷阱，口口相传，可并未见有哪位学者对为何有“陷阱”给出论证。简单的分析是有的，不过都似是而非、不能令人信服。问题是，用一个有待论证的“理论”给中国经济下定判，这样做是否有些失之草率呢？

我看到的文献，“中等收入陷阱”的发明者是世界银行。2006年世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意思是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通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在工资成本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新技术方面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上下被挤压，于是中等收入国家很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骤然听似乎不无道理，然而深入想却疑点多多，让我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比低收入国家高，这当然是事实；在高新技术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存在差距，也是事实。然而这事实怎可推出中等收入国家必陷入停滞呢？不要忘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但技术水平却比低收入国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水平不及高收入国家高，可工资成本也相对低。故与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在工资成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具有优势。这样看，中等收入国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谁说中等收入国家只能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天下没这道理吧！

其次，一个新理论能否成立需经过实证，只有经过实证未被推翻理论才算成立；若一旦被事实推翻，理论就不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成立？赞成者大多举东南亚与拉美国家为证：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而到2008年达8209美元后就徘徊不前了；

再看阿根廷，1964 年人均 GDP 约 1000 美元，上世纪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2008 年又回升到 8236 美元。东南亚与拉美类似的例子多，经数十年努力都一直未过 1 万美元。

以上举证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但要指出的是，科学验证的重点是证伪而非证实。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均认定乌鸦是黑的，但若有人举证有一只乌鸦是白的，那么“乌鸦是黑的”就被推翻了。验证“中等收入陷阱”也如是，只要能举证有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未落陷阱，则“陷阱说”就立不住。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当然有。比如今天高收入的美国当年就未遇陷阱；日本 1972 年人均 GDP 约 3000 美元，到 1984 年就突破 1 万美元，由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 12 年；韩国的时间更短，只用了 8 年，1987 年人均 GDP 约 3000 美元，1995 年就达到了 11469 美元。

再次，经验说，不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经济都可能出现停滞。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战后便风光不再，今天在经济上已成二流国家；美国堪称世界经济老大，可上世纪 70 年代也曾出现停滞，6 年前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低收入国家呢？经济停滞的例子更多，俯拾即是。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增长停滞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又何必要危言耸听，搞出一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

中国当下经济下行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一是国内产能过剩，调结构需要时间；二是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 达 56 万亿，基数如此之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显然，以上这些因素皆与所谓“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无疑是庸人自扰，除了误导决策，我看不出会有半点用处。

曾说过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我一贯看好，今天仍不变。事实

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力：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虽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比低收入国家要先进得多；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一些，但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减少体制掣肘利用好我们的优势，长远地看，对中国经济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

当下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调结构。产能过剩必须调结构，阵痛在所难免，增速也会低一点，但这是必付的代价，决策层要有心理准备，也要有自信与承受力；另一点是扩内需。中国近 14 亿人口，扩内需得天独厚，敢肯定，若能将国内需求带动起来，中国经济保持 10 年 7% 增长绝不成问题。

二、拉动经济重点在扩消费，消费与投资合起来才是一驾马车

学界称“投资、消费、出口”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当年在大学听教授讲“三驾马车”逻辑井然，我没怀疑过；后来自己读凯恩斯的《通论》，凯氏只强调投资与消费，未提出口，暗想可能是他疏忽了，不过脑子里就那么一闪，未作深究。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为保增长推出 4 万亿扩需，危机是成功应对了，可今天的产能过剩令人头痛，于是让我再次想到了“三驾马车”。

这里我不是要评点 4 万亿扩需计划，但有教训还是应总结，当然总结教训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对“三驾马车”从理论上作反思。我的问题是这样：众人皆说“三驾马车”能拉动经济，倘如此，那么它们拉动经济的机理是怎样的？或者说投资、消费、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作用有多大？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心中有数政府才知下一步如何出手。

毫无疑问，若从某个时点看，“三驾马车”皆能拉动经济。凯恩斯当年说，经济萧条是源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判断是对的，企业

把产品生产出来后没人买，产品压库，资金不能回流再生产便难以为继。凯恩斯又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政府去刺激投资或消费，能将那些压库产品卖出，企业则可继续生产。短期看，此推理逻辑上无破绽；但要是从长远看，以上分析又并非无懈可击。

多年前我曾撰文分析凯恩斯理论的疑点。众所周知，凯恩斯虽然主张刺激投资与消费，但认为扩需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是投资对扩需有乘数效应。我的疑问不在“投资乘数”是否存在，而是认为消费也有同样的效应。其实不只我这么看，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讲“投资乘数”，同时也讲“加速原理”。不过前者是强调投资变动带动收入（需求）变动，后者是强调消费变动带动投资变动。既然消费能带动投资变动，自然也就能带动收入变动，殊途同归，是一回事。

举例说吧。某发电厂投资 100 万，其中 80% 用于买煤，20% 用于消费，这样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 80 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 80 万的 80% 买机械，20% 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 64 万的收入；机械厂用 64 万的 80% 买钢铁，20% 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 51.2 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 100 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 500 万的总收入，故投资乘数为 5。若换个角度，消费者拿 100 万去买私人轿车，那么汽车厂可得 100 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 100 万，可再用 80 万买钢铁，20 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 80 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 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 500 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未免有些牵强。

我的另一困惑，是投资对拉动需求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投资肯定能扩内需，效果也立竿见影；可问题是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道理简单，增加投资虽可减少企业积压，但一旦投资完成又会形成新的产能，假若消费跟不上，对原本过剩的产能就会百上加斤。这道理凯恩斯当然明白，所以他提出要重点投资公共设施，公共设施既不形成新的产能，还能带动私人投资，可一石二鸟、一箭

双雕。

是的，投资公共设施不增加产能，而且也无需卖，似乎不存在“压库”一说。然而想深一层，若公共设施投资过度，导致设施闲置实际也是过剩或“压库”。再说，无论在何经济发展阶段，公共设施需求都是有限的，目前北京至天津建两条高速路已足够，就没必要再建新的高速吧？所以试图通过持续地投资公共设施拉动企业投资，甚至将公共设施投资当作拉动经济的“永动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说我的看法，与凯恩斯相反，我认为扩需的重点不是投资，而是拉动经济的另一驾马车——消费。明显地，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而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近年来中央在讲扩需时的变化。十七大之前是讲“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是提“消费、投资、出口”。显然，消费与投资的排序变了。不要以为只是小的改变，排序改变的后面其实另有深意，至少说明中央认为对扩内需来说消费比投资更重要。

为何中央会这么看？用不着讲高深的理论，我们只需弄清一点，即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不二的答案当然是满足消费。既然生产是为了消费，那么无消费的生产就是为生产而生产。试想，为生产而生产是啥意思？生产不为消费岂不是发神经？所以扩内需必须以消费为先，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用投资带动增长。事实上，任何没有消费的投资都是无效投资，除了增多GDP，其他毫无意义。

最后再说“出口”。不少人以为增加出口能扩大需求，其实这只是个误会。不错，将国内过剩商品出口到国外，短期会减少国内库存，拉动国内投资；但要知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并非为了转嫁过剩，而是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这样在出口的同时，就必须进口，否则只出不进或出多进少，那等于是拿国内资源去换人家的纸钞（外汇）。请问不进口你要外汇做甚？若出多少就进多少，出口又怎会增加内需？由此看，凯恩斯当年未将出口作为拉动需求的马车并非他的

疏忽。

所以我的结论是：拉动经济只有“消费”与“投资”一驾马车，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即“投资”得以“消费”为牵引。至于出口，那是国家间互通有无，若是进出口平衡，出口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而此结论的启示是：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关键在扩内需，尤其是经济大国，更不可将“注”押在出口上。

三、扩消费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要尽量减少政策掣肘

思来想去，此问题的难点是消费不同于投资，政府掌握着财政大权，扩投资可说是易过借火；但扩消费不同，消费是个人行为，老百姓自己挣钱过日子，怎样消费不会听政府招呼，而政府又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过换个角度想，政府虽不能直接干预个人消费，但却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予以引导。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或者说要怎样设计才对？

事实上，中央早就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我理解重点有二：一是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收入决定消费，收入增长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二是适度通胀的机制。大众消费买涨不买跌，若今天不买日后更贵，当然也会刺激消费。除了这两条，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清理抑制消费的相关政策，不然政策相互掣肘，扩消费也难以施展开，不会有大作为。

以上三条，从理论看应当无懈可击，可一旦进入到操作层面却并不容易做。比如“收入增长”，中央说要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这个目标当然好，也是人心所向。然而居民收入（工资）决定于企业的初次分配，工资到底增多少政府说了怕是不算。我们知道，企业初次分配有三块：即工资、利润与税收。要是不减税，政府强逼企业提薪，那样工资挤占利润，利润被挤企业投资会减少，失业增多则

工资反而会降低。

绝非危言耸听，有前车之鉴：2007 年底出台的新劳动法，言明要提高最低工资，由于当时没减税，结果工资普遍地挤了利润；碰巧 2008 年又赶上美国金融危机，内忧外困，据统计当年就有近 9 万家企业停产，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别误会，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新劳动法不该提高最低工资；我想说的是提高最低工资可以，但应该先减税，不然政府只请客而不买单，加重了企业负担后果更糟糕。

关于“适度通胀”，之前我写过多篇文章，重复的话不再说，这里只指出两点：第一，通胀并非洪水猛兽，高通胀对经济有害，但适度通胀对经济却有益，至少它能刺激消费；第二，何为适度通胀？按世行的解释，是指通胀率不高于 GDP（或财政收入）增速。这解释没错，我同意；不过前提是居民收入得跟上 GDP 增长，否则即便通胀适度，居民实际收入也可能下降。鉴于此，与其将通胀率绑定 GDP，还不如直接绑定居民收入。只要通胀率不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则为“适度通胀”。

难题是怎样防高通胀？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只要投放货币不过多，通胀绝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防高通胀关键在控货币，所谓“成本推动通胀”的说法是错的；“结构性通胀”的说法也是错的。国内学界有一观点，认为我们前几年通胀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于是主张政府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农产品涨价是因为供不应求，限价只会事与愿违，令供应更短缺。再说，出现高通胀原来是央行的错，为何要去责罚农民？

转谈政策吧。是的，当下某些政策确实抑制了消费，最典型的要数“限购”。前几年国内房价上涨，为控房价政府推出“房产限购”政策；无独有偶，为缓解交通压力不少城市又出台了“汽车限购”政策。不必怀疑政府这样做的初衷，但限购无疑也压制了消费。如果说 10 多年前国人消费热点是家电，而今天的热点则是买房购车，若这

两项皆被“限购”了，请问又何以提振消费？并非扣帽子，近年来经济下行原因虽多，但“限购”恐怕难辞其咎。

我不主张限购，可房价高了低收入者买不起房怎么办？难道政府就坐视不管？当然不是。居者有其屋，照顾穷人住房政府责无旁贷。但住房与买房是两回事，帮助穷人居住政府可提供廉租房，不必打压房价。可以肯定，即便目前房价跌一半，穷人还是买不起。而房价大跌极可能使今天的有房者变成“无产者”；甚至有人还不起房贷而拖累银行，酿成金融危机。

有人说住房是特殊商品，但无论它怎样特殊终归还是商品。是商品，价格就要由供求定。如果我们相信供求定律，就绝不会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8年前我写文章说“房产升值不是铁律”，并断言10年内国内房价必降无疑。现在看是说中了，可我那并不是望天打卦碰运气；而是基于房地产供求分析所得的判断。眼下房价正在回落，据说不少城市房地产“限购”已开始解禁，是好消息，能早解禁就早解禁吧。

我有预感，解禁汽车“限购”应该也是迟早的事。对交通拥堵政府当然要管，而且必须管，但不一定非“限购”不可。你想，企业有汽车要卖，工人要就业，各地都限购汽车厂家岂不要关门？所以从扩消费的角度看，可取之策是“限用”而非“限购”。人们想买车尽管买，但用车要限制。比如“限号出行”或“提高停车收费”同样可缓解交通拥堵，而且国外的经验也证明行之有效，既如此我们何必去限制“购买”呢？